

中国经济经典的

文化逻辑

庞毅 著

中国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之小，

和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

国家之大，

在中央集权和

政治—伦理本位的

文化黏合之下，

结合得如此和谐

如此美妙。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结构方式，

构成人类封建文明的

黄金组合，

从而取得如此辉煌的

历史成就……



另眼看经典

大象出版社

【另眼看经典】

中国经济经典的文化逻辑

庞 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眼看经典:中国经济经典的文化逻辑/庞毅著.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8. 5

ISBN 978 - 7 - 5347 - 4888 - 2

I. 另… II. 庞… III. 经济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F1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6933 号

责任编辑 郭一凡

责任校对 崔 靖

封面设计 刘 & 王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河南省新华书店

制 版 郑州普瑞印刷制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02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目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社会与经济经典	(1)
一、 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3)
1. 相对封闭的地缘结构	(3)
2. 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6)
3. 家国同构的组织体系	(11)
4. 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	(15)
5. 修齐治平的道德信念	(19)
二、 中国古代经济经典的界定	(22)
1. 什么是经典	(22)
2. 中国古代经济经典撷英	(23)
三、 中国古代经济经典的特性	(40)
1. 经济经典的非理性化	(40)
2. 经济经典的非体系化	(42)
3. 经济经典的隐性化	(43)
第二章 中国古代经济经典的纲领——儒学依赖	(46)
一、 中国古代历史的文化主题	(46)
二、 理论观点的儒学化	(48)
1. 平均主义的分配观	(49)
2. 重本抑末的产业观	(58)
3. 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62)
4. 崇俭黜奢的消费观	(63)
三、 治理经济的自然秩序	(65)
1. 先礼后经,天下安而后有农	(66)

2. 先义后利	(68)
四、 经济经典的发展曲线	(69)
第三章 中国古代经济经典的品性——政治主宰	(81)
一、 思想家身份的政治性	(83)
二、 经典主旨的政治性	(85)
三、 经典内容的政治性	(87)
1. 经典内容的表现方式	(87)
2. 内容多与集权专制统治密切相关	(88)
四、 经典的效用分析	(92)
第四章 中国古代经济经典的基石——小农文化	(105)
一、 中国小农经济的文化特性	(105)
1. 从需要统一到要求一统	(106)
2. 从以商补农到重农抑商	(111)
3. 从勤劳节俭到不思进取	(121)
4. 从顺乎自然到难于创新	(123)
二、 中国古代重农思想的流变	(127)
第五章 中国古代经济运行的调节剂——变法求治	(139)
一、 立基之变	(144)
二、 建业之变	(148)
三、 求存之变	(153)
四、 求生图强之变	(155)
五、 革命之变	(157)
第六章 市场经济之路与新文化支撑点	(161)
一、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经济学的理论支撑	(162)
二、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	(167)
三、 现代市场经济是企业为主体的经济	(171)
四、 现代市场经济是有限政府管理下的经济	(173)
五、 现代市场经济需要双重价值定位	(177)

第一章 中国古代社会与经济经典

本书要讨论的问题是古代经济经典的文化逻辑。

何谓文化逻辑？所谓文化逻辑，就是从大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经济经典思维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性。或者换句话说，中国古代经济经典的文化逻辑，就是指在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经典与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

经济经典与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是不言而喻的。经济经典作为中国古代经济结构、运行方式和发展变迁的深刻反映和集中体现，首先要受到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从另一个角度看，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也自然会体现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经典之中。我们知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西方经济学乃至人类经济学史上的经典文献，它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面世，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理结构和内在规律在理论形态上的科学反映。但它不可能产生在古代中国，而只能产生在18世纪的英国，只能产生在已经在国际上取得经济领先地位的英国，只能产生在资产阶级已经取得光荣革命胜利并已占社会统治地位的英国，只能产生在机器生产已初见端倪的英国，只能产生在涌现出以牛顿和洛克为代表的科学和思想人物的英国。没有这些社会文明的积淀和支撑，任凭你亚当·斯密再聪明十倍，再天才百倍，也写不出《国富论》。

与亚当·斯密同时期的中国，能与《国富论》一争高下的经典文献非《红楼梦》莫属。虽然《国富论》和《红楼梦》均代表了彼时两个国度的文明成就，但其差异却是多层面和多角度的。前者为经济经典，后者为文学经典；前者为新文明唱赞歌，后者为旧文明吟挽歌；前者为工业革命的发展预言，后者为封建王朝的衰亡预言；前者为工场手工业时代集大成，后者为清代文学登峰造极。两者的差异还可以枚举许多，比较的目的，不是要论其高下优劣，而是要说明：不同的社会文化基础，产生不同的社会经典；不同民族的经典文献，反映不同民族的文明类型和文明进程。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与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

文明并称四大古文明。不仅如此,中国文明还是所有古代文明类型中唯一没有发生断层的文明类型,绵延 5000 年不曾中断。因为历史悠久又不断延续,所以中国历史科学也特别发达。因为历史悠久,历史受到重视,历史典籍非常丰富,历史科学也较为发达。由于历史科学发达,对历史的概念自然有精确的要求。前些年,中国有一项国家级的科研攻关项目,曾引起世人的瞩目,那项目的内容,就是夏商周的历史断代问题。可见中国人对本国历史断代问题的重视程度。

本书要讨论的是中国古代的经济经典问题,那么对古代的历史界限又如何认定?其实,对古代这一概念的理解,可以有多角度的认识。原本西方人和中国人就有不同的分期方法,而且对世界史和中国史也有不同的分期。本书所指称的中国古代,是一个概称,它笼统地把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历史称为中国古代。由于春秋战国前中国古代经济经典还比较少见,因此,本书的中国古代,特指春秋战国到辛亥革命期间的中国历史。而这一历史时段又几乎与中国封建时代完全吻合,故本书的中国古代,又特指中国的封建时代。

说到中国的封建时代,也许有读者朋友尤其是青年朋友会提出疑问。世界已进入 21 世纪,如果从 2000 年算起,21 世纪已走过 7 个年头,如果从 2001 年算起,也已走过 6 个年头。以中国目前的状态看,中国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建设。在 21 世纪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此深入细致地翻检中国封建时代的典籍,还有没有意义和价值,与其一步一回头,不如昂首阔步朝前看。

回答是肯定的。不错,中国拥有悠久而辉煌的封建文明,因其悠久而辉煌,又使中国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以至于几百年来步履蹒跚。而且,市场经济,工业时代,法制社会,对于中国人而言,虽然似曾相识,但却知之不多,没有深交。要不为什么前一段我们还在世贸组织中,为中国是否能够得到市场经济地位而耿耿于怀?但是,走现代化的道路,发展市场经济,是全体中国人民经过 100 多年的艰难探索而达成的共识。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继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业文明过渡的转型时期。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现代化事业,不是在其他土地上进行的,而是在曾经创造过历史辉煌,也曾曾经蒙受过历史屈辱的土地上进行的。中国之所以在近现代落后于发达国家,不仅在于对西方社会的发展缺乏认识 and 了解,尤其在于对自身发展局限缺乏科学认识。否则,便不会有对中国封建王朝衰亡预言——《红楼梦》的封杀,也不会有闭关锁国的腐败统治,更不会有固步自封的夜郎自大。所以,当我们在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同时,有必要对历史进行整理和反思,找出其弊端,以便继承传统,摒弃糟粕,遵循人类发展的规律,创造新的辉煌。

本书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对中国古代经济经典的解析,探索中国古代经济

思维的规律,发掘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产,反思其利其弊,尤其是找出其不利于发展的弊端。在中国经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和变革的历史关头,进行这种反思和探索,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

既要探索经济经典与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自然要对制约和影响经济经典的宏观文化环境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所以,研究中国古代经济经典,首先要研究中国古代社会,要重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经济经典的内在联系,重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直接制约着中国古代经济经典的产生与发展。

一、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1. 相对封闭的地缘结构

地缘结构说的就是地理和自然环境。

地理和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诸多特征的首要因素,因而也是人类社会主要特征的自然前提。地理和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是和人类的历史命运相始终的。当然,这种作用的大小和程度以及作用的直接与否,是与人类文明发展阶段的不同密切相关的。一般说来,越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这种作用就越越大越明显越直接,越是到人类文明的成熟阶段,其作用就相对变小。特别是进入现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生产水平成倍提高,人类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经济活动和军事活动,似乎出现距离自然环境越来越远的趋势,以至使人们反而常常有意无意地忽视其作用。正因为出现这种忽视,比如工业化的发展无疑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又造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环境的极度破坏和污染,所以,才有罗马俱乐部提出振聋发聩的警告——人类社会的发展已出现“增长的极限”,才有1983年11月成立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才有该委员会1987年提出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才有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中国人对地理和自然环境的作用表现出一种奇特的不屑一顾的态度。比如,为了突出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不顾地理和自然条件的适宜程度,不管你宜林,宜牧,还是宜渔,一律以粮为纲。到头来,不仅粮食生产的增长有限,而且影响了林业牧业渔业等发展,甚至破坏了自然环境。之所以说是一种奇特的态度,因为从历史传统上看,中国人是讲究天人合一观念的,虽然这种重视地缘作用更多是微观角度和功利层次的,比如风水术等;再从中国发展的状况看,彼时中国的发展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自然条件,反而置自然条件于

不顾,一味追求“与天奋斗”的“乐趣”。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社会发展的宏观战略角度,对地理和自然环境作用的重新认识。这种认识,是中国人民经过无视自然条件和忽视自然环境两方面经验教训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现代中国人喜欢称自己为炎黄的子孙,所谓,“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那就是说,中华民族是以炎帝、黄帝生活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作为文化发祥地的。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个发祥地位于地球上最辽阔的大陆板块——亚欧大陆的东侧,东临世界上最浩瀚的大海——太平洋,西南部是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青藏高原,西北、西部、西南深居亚欧大陆的腹地,是陆海兼备的大陆—海岸型国家。它以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为基础,其中,黄土高原是最古老的文化摇篮。对于这片中华始祖的文化栖息地,《尚书·禹贡》是这样进行描述的:“东渐于海,西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尚书·禹贡》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这恐怕是对中国古代地域最早的文字描述。东部进入大海,西部到达沙漠,北方、南方连同声教都到达外族居住的地方。这些文字非常清晰地概括了古代中国东面向海,其他方向因“流沙”等屏障而难以逾越的地理环境。对此,屈原也有形象的描述:

东有大海,溺水漉漉只。

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

西方流沙,滂洋洋只。

北有寒山,连龙赭只。^①

这个领域,大致为东到大海,北到长城,西到甘肃,南到长江以南。在这个广阔的领域内,便于农业生产,阳光充足,雨水适中,地势平缓,土壤肥沃,因而成为世代代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但是,古代中国,在交通不便,科学技术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一旦越过这个领域,便会四面受阻,难以发展。或者受困于天然屏障,难以逾越,比如西面的沙漠和戈壁,东面的大海;或者罹患于自然环境之险恶,不易生存,比如南方的丘陵山地和瘴疠之气;或者忧于文化差异的冲突,难以沟通,比如北面自然环境阻碍虽小,但与游牧民族为邻,文化差异和矛盾较大。

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仿佛一个大的向心的圆圈。越是中心地区,越是中原地区,发展也越充分,自然也要求统一。所以,中国对“中”字既情有独钟,也确实有心得;因为它本身有着最充分的地理根和文化根据。在这个圆圈之外,又是

① 屈原:《楚辞·大招》。

高度的封闭,既然不能向外发展,也不容别人把脚插进来。所以,北面本无自然之险,却要不顾一切建立人工之险,远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修筑长城。这道万里长城,固然是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成为古代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扰的坚固屏障,但它也构成人们自我封闭的心理屏蔽。

因为古代中国的这种地理和自然环境,使中国成为典型的内陆性国家,虽然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它具有向心的选择,它的文化品性不是外向的,而是内向的。这种地域结构决定了中国的生产方式,以自然经济为主。而自然经济的发展,又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保护。这种地缘环境,自然为农业发展,为家庭本位的建立,为中央集权统治,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这一点在奴隶社会也许还不显得那么充分,但在自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这种需要就变得更加强烈。铁器的使用令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出现质的变化,正是这种文明程度的提高,要求社会的稳定和统一,以保护达到一定高度的文明。所以春秋战国时期虽有 200 个小国,但无义之战的趋势,是向大一统的方向发展,而且也不容你向其他方向发展。结果,“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①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直到秦始皇建立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顺应了这种趋势,也把握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同时,由于古代中国缺少向外发展的可能和优势,也决定了它很难从内陆文化的束缚中挣脱出来。

中国地缘文化不仅作用于本土,而且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整个古代,中国周边地区的文化类型,不是游牧文化就是小国寡民、刀耕火种式的半原始状态。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有数次被外来文化入侵,而最终反被中原文化同化,其原因就在于这些文化类型相对于中原文化而言,处于落后和原始状态,而文明终究要取代愚昧,如果不顺应这种历史规律,即便你是战胜者,也将丧失立足之地。古代中国之所以能被周边国家供奉不绝,不但在于中国的强大,也在于这些国家的落后。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农业文明兴盛之果,又成为农业文明衰落之因。中国文化的强盛和向心作用,又促使中国逐渐在民族姿态上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误区,所以,当世界先进文化出现时,自然会不屑一顾。不但不会向人家学习,反而还一味要求人家对自己屈服。

中国地理和自然环境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因河而兴的大陆文化,虽然河水不止一条,而是黄河和长江两条。当然还有学者认为珠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这个说法或许可以成立,但那主要的源头,还是黄河与长江。西方著名学者卡尔·魏特夫有所谓治水社会理论。他认为,古代特权文化都是治水文化,

^① 李白:《古风》其一。

而整个世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非治水地区,像西欧、北美和日本属于这一类,其余基本上是治水社会。治水社会形态主要起源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在这类地区,只有当人们利用灌溉,必要时利用治水的办法来克服供水的不足和不调时,农业生产才能顺利和有效地维持下去。这些灌溉和治水的工程,时刻需要大规模的协作,这种大规模的协作自然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而要有效地管理这些工程,必须建立一个遍及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组织网络。因此,控制这一组织网络的人总是巧妙地行使最高政治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专制君主。由于治水社会都存在于习惯上称作东方的地区,所谓治水社会,也可称之为东方专制主义。^①

魏特夫的理论很有道理,至少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状况,符合他所说的情形。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治水社会,大禹治水的传说,可以说是这种情形的生动描述。

中国独特的地缘文化,适宜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华民族祖先的伟大之处在于:古代中国人不仅在这块土地上使农业生产得到充分发展,养育和繁衍了世代炎黄子孙,而且以自己的令人勤劳和创造精神创造了辉煌的绵延数千年的农业文明。客观地说,中国独特的大陆文化,作为人类子孙发展的一种类型,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典型代表。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它所取得的文明成就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2. 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

中国是人类种植业和养殖业的主要起源地之一,中华民族则是世界上最早从事农业生产的民族之一。中国的农业起源于大约 10000 年以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初期,中国最早驯化和种植的粮食作物,北方是粟(谷子)和黍(糜子),南方是水稻。1993 年、1995 年分别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距今 10000 年或接近 12000 年的古栽培稻遗存,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的粟炭化遗存,距今已有 7000 年。^②此外,中国还是大麻和苧麻的原产地,它们作为华夏祖先最早驯化和栽培的纤维作物,距今已有 5000 年左右的历史。

中国作为农业大国的历史,至少延续到了上个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1949 年,中国的农村人口还占全国总人口的 90%,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

^① 参见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

^② 朱乃诚:《中国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的新进展》,《光明日报》2000 年 7 月 28 日。

的70%,可谓不折不扣的农业国家。即使到了改革开放的1979年,中国的农村人口依然占全国人口的67.5%,达到9.7亿人,农业总产值也仍占到工农业总产值的25.6%。^①

中国农业的历史悠久,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又不是与生俱来的。在漫长的奴隶制时期,在农业生产的组织和劳动上,基本上实行奴隶大生产,并采用两人协作的耦耕制。《诗经》对此亦有生动的描述:

骏发尔私(快点带着你的农具),
终三十里(面对这三十里广阔的地方),
亦服尔耕(大伙儿都来耕地呀),
十千维耕(万人出动,配呀配成双)。^②

千耦其耕(千对的人呀在锄草),
徂隰徂畛(在田里,在田埂)。^③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以后,尤其是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的瓦解,特别是铁器农具的广泛使用,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高,粗放农业向集约农业转变,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得以确立。它也正好与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相吻合。

所谓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指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家庭成员自然分工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形式,是“男耕女织”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因其经营规模以家庭个体劳动为主,又称为小农经济。中国小农经济基础的确立当在战国时代。这时,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牛耕的初步推广,及手工业和商业的相应发展,各诸侯国逐渐废除原来定期重新分配的授田制,把原来由农民耕种的公田赏给贵族、官吏,井田制下的公社内部也不再重新分配份地,农民可永久占有和使用份地,并使其逐渐演变为私有。同时,由于各诸侯国实行奖励耕战政策,使一批战功和事功卓著者成为地主,而原有宗法制度下分割土地和臣民的奴隶主贵族趋于衰落。土地买卖也开始出现,新的土地租佃制度开始发生和发展起来。此时,发生在秦国的商鞅变法,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商鞅变法的中心问题是农业和军事,而从其实质看,其关心军事的程度又不如关心农事。由于变法在农事中投入心血更多,所以取得的成绩更大。商鞅变法的一大措施,就是实行小家庭政策,该政策不许在一个家庭中有两个成年男子,凡有两个成年男子之家,必须分家立户。这显然是在强制人们更多地参加农

①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1),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年。

② 《诗经·周颂·噫嘻》,采用金启华译诗。

③ 《诗经·周颂·载芣》,采用金启华译诗。

业生产劳动。分家则分地,分家分地则不再有依赖性,从而在体制上保证了农业的劳动投入。商鞅变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改革税赋制度。秦在商鞅第二次变法前,实行按地亩征税,商鞅二次变法后,实行按户纳税的制度。按户纳税,则不问你田多田少,也不问你有田无田。禁大家行分户令,再加上按户纳税,其结果是只有多置田多种地才能多收,才能保证生活和富有,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

商鞅变法使小农经济制度在秦国得以建立,标志着小农经济制度至少在商鞅时代已开始确立。小农经济制度的建立,不仅为秦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评价商鞅变法的历史作用,无论如何褒扬都不过分。

既然农业经济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土地自然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富。自从战国时期出现土地私有后,直到辛亥革命,全国的土地始终分为官地和私有地两部分。尽管历朝历代官地和民地的比重各有不同,但民地比重的不断加大总是发展趋势。19世纪80年代,官公地约占25%,私有地约占75%。到20世纪30年代,私有地甚至达90%左右。

与欧洲中世纪土地的领主所有制不同,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之一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的私有化导致土地买卖的流行,土地买卖又造成新的土地占有不均。虽然农民取得土地所有权,但由于经济力量薄弱,经不起封建赋役的重压和商业高利贷的盘剥,随时存在丧失土地的危险,因而同时也失去了生产条件的保障。所以,占有土地的主要是官僚、军阀、地主、商人、贵族和少数经济地位上升的富裕农民,广大农民占地很少。地权的分配状况,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很大,且由于缺乏统计资料,因而难以准确估量。北宋中叶时,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官僚豪绅大地主所占有的土地约占全部已垦土地70%。^①到20世纪初,全国约有30%—40%的农民完全没有土地,60%—70%的有地农民约占有40%—50%的土地,其余50%—60%的土地为地主富农占有。^②

土地的经营可分为出租和直接经营两种方式。农民占有的土地一般自己耕种。而官僚、地主、商人占有的土地,与劳动力结合的基本方式又有两种:绝大部分是分散出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另一种是使用雇工、奴婢或其他劳动者耕种。

根据地权状况的不同,中国封建时代农民大部分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拥有少量土地的自耕农;一种是没有土地,租佃地主或官地的佃农,他们虽然没有土

① 参见《文献通考·田赋考四》。

② 参见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

地,但是具有相对独立的个体经济形态;一种是完全靠出卖劳动力,受雇于人从事农业生产、家庭手工业生产或家务劳动的雇农。佃农在汉代前并无正式名称,笼统称之为“贫民”。公元208年,西晋颁布的占田令规定“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①从此佃客、地客、田客、佃户等成为佃农的正式称谓。佃农与地主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租佃关系,还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虽然到明清时这种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但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依然十分严重。

农民中自耕农和佃农的比例也因时因地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当地权分散时,自耕农数量较多;而当土地兼并加剧,自耕农不断贫困破产,佃农人数就迅速增加。受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周期的影响,多数朝代的前期,都有数量不等的佃农通过垦荒或国家授田而成为自耕农。到了中后期,则由于封建赋役的重压和地主、商人兼并的加剧,自耕农又会丧失土地,沦为佃农。从总的发展趋势看,越到封建社会后期,租佃关系的范围就越大,佃农的人数也不断增加。据估计,唐代以前,佃农的比例并不大。北宋时期,佃户已占到总户数的35%左右。到了清康熙年间,南方各省的佃农甚至占到农户的60%—70%。^②

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土地私有化的发展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社会进步。土地不能买卖,则土地的使用缺乏活力,也不能提高土地的管理水平和使用价值。但土地的过度买卖,又会导致地权兼并的加剧和土地分配的严重不均,从而产生大量的流离失所者,出现大量的流民。中国封建历史上出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与土地兼并的加剧有着必然的联系。

古代中国,地理和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的生产方式应以自然经济为主。而自然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有一个良好的特别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保护。这一要求,或许在奴隶社会表现得还不强烈,但在铁制农具被普遍使用,自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这种要求就变得日益强烈了。商鞅变法后确立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无疑为自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证。它使土地、劳动力、家庭、农业、自给自足这些因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男耕女织祥和安谧的田园诗景象。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小农文化,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和本质特征。难怪到了近现代,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袭下,“耕”和“织”的自然分工一经解体,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使命也就土崩瓦解了。

也许有的读者朋友会问,中国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西欧中世纪也是小农经济,为什么西欧的小农经济如此脆弱,以至于令马克思把它比喻为马铃薯,而中

① 《晋书·食货志》卷二六。

② 参见刘克祥:《简明中国经济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国的小农经济如此稳定坚固,不仅绵延 2000 年之久,而且创造了无比辉煌的农业文明?

实在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它是中外学者几百年来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也是本书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为何同为小农经济,在东西方有如此迥异的文化表现?

我们先看马克思对“马铃薯”的比喻。这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对法国农业经济的一个形象概括。先看法国小农状况: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都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块小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①

再看看马克思的形象概括:

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②

其实,这种单个“马铃薯”的状况,与中国的小农经济个体并无本质区别。在法国表现为“马铃薯”,在中国则体现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然而,以小农经济为主体和基础的小农文化,则中国的情形不仅与法国不同,与整个欧洲也不同。

西欧领主制的小农经济,是以封建庄园为基础的,每个庄园都是一个独立的王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而每个农户又是王国中的小王国。每个庄园又分属不同的领主,有的封建贵族拥有多达几千个庄园,不同的领主又呈封建割据状态。加上欧洲封建社会不是中央集权的社会,而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封建制度一般是与公共权利的深刻危机及无秩序地分散到地方领主手中相联系的。于是,与中国封建地主制小农经济相比,西欧的小农经济表现出三个层次的脆弱: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693 页,人民出版社,1972 年。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693 页。

第一个层次:农户家庭经济的脆弱;

第二个层次:庄园经济的脆弱;

第三个层次:领主封建割据的脆弱。

这三个脆弱叠加在一起,西欧的小农经济只能成为马铃薯的堆集。而中国封建地主制小农经济则不同,虽然在农户家庭自然经济层次上,和欧洲的小农经济同样是自给自足,是分散状态,缺少社会交往,因而同样的脆弱。但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有通过郡县制体现的中央集权统治的权威;有家国同构的组织体系;有等级森严的官本位体制;有儒家政治理念和道德信念等。正是这些中国特有的文化因素,使在欧洲成为马铃薯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则变成了混凝土。只不过构建这混凝土的不是钢筋和水泥,而是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和政治—伦理本位的文化黏合力。

3. 家国同构的组织体系

所谓家国同构,是说中国封建社会是家庭式的国家,又是国家式的家庭,家庭与国家属于同样的结构类型。因此治家如同治国,治国有类于治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家,都是说得通的。

中国小农时代的家庭,就好像一个小朝廷,其中的男性家长,就是这家庭中的皇帝。这种影响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依稀可见。谁家新添了儿女,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家只能生育一个子女,因其娇贵,就把这独生子女昵称为小皇帝。而中国小农时代的王朝,又有点类于一个大家庭,这王朝的皇帝,俨然这个大家庭中的男性家长。皇权固然高于一切,然而他尊重并保护家庭。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家庭是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只要家庭稳定,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稳定就有了保证。因为封建家庭就是皇权生存的最坚实基础,只要这个基础牢固,不管发生什么风吹草动,什么天崩地裂,都可以照样做皇帝。

上有皇权,下有家庭,封建王朝便可组成一个大的网络。皇朝就是家族,也是一个大家庭,天下归于一家人,自然也就是一家的天下。所以武则天夺权,徐敬业讨伐,骆宾王写讨武檄文,那结尾的两句便是:“试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红楼梦》本是描写贾、王、薛、史四大家族的衰亡史,但皇族是最大的家族,王朝就等于家族,本王朝正处鼎盛之时,岂容贾、王、薛、史家家族的衰亡所隐喻,自然不能让这样的甄士隐语流布于世。因为皇帝是最大的家长,所以皇帝也称君父,所谓君臣如父子。老百姓则俗称皇帝为皇帝老子。纵然这皇帝只是未断奶的婴儿,天下百姓无不是这君主的臣子,当然也包括耄耋之年的托孤名臣。也惟其如此,古时候那些德高望重的名臣可以享受最高的荣耀,便是被尊称为

父。帮助周文王、周武王兴建周朝大业的姜尚,被尊为尚父;帮助齐桓公成就春秋五霸之首的管仲被尊为仲父;帮助刘备、刘禅父子鼎立西蜀的诸葛亮被尊为相父。这种荣耀不只是名义上的荣耀,更是道德上的荣耀,所以孔明先生要对刘氏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因为皇族是大家庭,而国家是最大的家庭。而家庭是以血缘的远近定亲疏的,所以,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对血缘关系都格外重视,而且越是位高权重者越不敢怠慢。天下既为朕一家之天下,封王自然为本家莫属。即使封王不能巩固皇权,但那兵权却必贵族才能担任。至于皇权的传承,更是不敢大意。首先讲究嫡传,而为保证家族血脉的纯洁,不惜把宫中的男役变成不男不女的残疾人。

因为重视血缘,重视家庭,所以最亲切的祝福就是祝人阖家团圆,幸福美满。因为重视血缘关系,所以骂人最恶者,要咒人家祖宗八辈;惩罚最严厉的,要株连九族;就连现代中国人政治审查,甚者便要查遍五服。

重视家庭当然就重视血缘,但人与人不可能都有血缘关系。于是类似于血缘关系的其他社会联系也被人们重视起来。

没有血缘关系不打紧,可以结拜为亲。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虽非血亲,胜过血亲。

师生关系也很重要。荀子认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①没有君王和老师,哪有天下的治理?可见老师的重要。所以,天地君亲师就成为古代中国人最须尊重和服从的人和物。老师不仅和天地并称,而且和双亲并称,所以才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师滴水之恩,学生涌泉相报。所以,血亲、义亲之外,又有师生之谊,又有同窗之谊,又有校友之谊,又有师徒之谊。不是血亲,有类于血亲,而且往往胜于血亲。

师生关系外,又有邻里、乡亲,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即便是现代的海外华人,哪怕他是几代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华裔,见到祖国取得新的成就,见到故乡的亲人,也不禁热泪盈眶。所以,宋代诗人汪洙把古代中国人的四大喜事写成五言诗,成为流传甚广的名句。那四大喜事之一便是“他乡遇故知”,诗的原是:

久旱逢甘雨,

^① 《荀子·礼论》。